

社会文化 与伦理道德

shehuiwenhua yu lunlidao de

美国90学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社会文化 与伦理道德

shehuiwenhua yu lunlidao de

美国 90 学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华 华

封面设计 闵 敏

社会文化与伦理道德

美国 90 学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618-492-9/C·74

定价:18.00 元

目 录

中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职业道德问题与职业

道德建设.....	黎 民(1)
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导控	陈必龙(1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的价值定位与层级	
结构的道德模型	李福海(20)
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对立统一关系	邵哲文(35)
论市场经济公共道德	王正平(48)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	
.....	钟启泉(57)
现代工商活动中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初探	王淼洋(69)
论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建设	陈 颀(77)
商品经济与道德建设	朱德真(89)
论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生长点.....	胡振平(101)
产权道德论.....	柳 民(114)
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之命运.....	韩东屏(125)
论法治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	蒋德海(135)
试论爱国情结文化	
——民族文化和爱国情感培养的研究.....	梅仲孙(152)
现代道德建构的历史性两难.....	刘清平(168)
走向一体多元的华人文化网络	

——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大趋势·····	赖存理(182)
在社会转型中提高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	
——纵论全面提高中国农民文化素质的	
有效方法·····	李匡夫 李天好(202)
社会转型期文学创作的重要功能和使命	
——读近年来部分小说创作·····	戴 翊(214)
选择、承诺、传习、理性	
——论主体的道德素质及当前社会道德变化的	
成因·····	晏开利(226)
精神文明建设基本思路四论·····	陆 震(237)
探寻道德原则,建立整合模式	
——中国当代伦理文化建设研究·····	肖雪慧(247)
中国现阶段家庭伦理之探究	
——夫妻伦理·····	王秀英(263)
试论我国现代家庭活动中的个人责任·····	冯桂林(279)
学会负责	
——为 21 世纪中国基础教育中的人道、伦理/	
道德、文化价值教育选择目标 ·····	胡 卫(298)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与现代家政礼仪 ·····	钱姐妮 313)
后记·····	(323)

中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 职业道德问题与职业道德建设

黎 民

始于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社会步入结构性变化最剧烈的时期。这种变化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繁荣、进步、活力;另一方面,它又伴生出无序,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在这些社会问题中,道德滑坡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在内的诸问题,尤其是职业道德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显然,考察当前中国职业道德问题的表现及特点,从现实与历史的结合上,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深入认识问题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中国职业道德问题的表现及特点

我们共同认可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个人只有被结合到社会群体中才能生存;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通常只有从事某种职业活动,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资料。因此,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业缘群体或者说职业群体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个人被结合到职业群体后,与职业群体内外的其他人除了具有一致性外,在利益等方面又具有差异性和矛盾性。为了使这种差异和矛盾能够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使职业活动以及整个社会的

生活能够维持和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手段来调节和控制个人的职业行为。在可供选择的控制手段中,除了职业制度、法律制度外,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是职业道德规范。职业道德作为反映和调整人们在职业活动范围内利益关系的特殊道德要求,其地位与家庭伦理道德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相似,也与社会公德在整体性社会中的作用相似。它主要通过外在的社会控制和内在的自我控制的方式,使社会中的各类职业活动显现出秩序性与和谐性。因此,职业道德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状况及其消长,既是折射社会职业生活的一面镜子,同时也对职业生活和整个社会的演化变迁以巨大的影响。

当前中国在职业道德领域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公众反映最强烈的是两类群体的职业道德问题:一是担任各种社会公职的阶层,二是与市场经济关系密切的工商、服务与文化传播等群体。

近年来,担任社会公职从而具有某种社会权力的阶层,在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蔓延的各种腐败行为。公职人员的职业活动,主要内容是行使公共权利,担任社会生活的执法人。因而,秉公执法是公务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腐败行为则是直接践踏了公务职业道德,将职务权利异化为私人“资本”,以权谋私。近年来腐败行为的主要指向,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个人捞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好处,包括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弄权渎职、铺张浪费、腐化堕落等等。

在工商、服务与文化传播业的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坑蒙拐骗活动猖獗。工商、服务与传播等行业的从业者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除了所从事的职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特殊要求外(如生产精神产品的产业负有传播健康文化的责任),其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按照公平交易的原则,用合乎质量标准的、诚实的产品和劳动,通过市场换取等量的报酬。

不顾交易对象或消费者的权益及人身安全,利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欺诈手段谋取暴利,是这类职业道德问题的共同特征。

总起来看,当前中国在职业道德领域的问题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职业道德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当前中国的职业道德问题,不是仅仅存在于少数职业之中,而是像一种流行病,弥漫许多职业领域。

第二,某些职业领域的问题特别突出。这些职业领域主要是:拥有较大权力又缺乏有效监督的职业管理人员,如厂长、经理、官员等;在市场经济中新兴的、同时制度建设滞后的职业,如证券、期货、房地产等;同市场和消费者关系密切,但约束其行为的市场法规不健全的职业,如某些支农产品、医药、饮食、服务、演艺业等。

第三,产生的社会后果具有严峻性。官员阶层的腐败,不仅使领导机关失去了效率和权威性,而且极大地动摇了公民的忠诚感和责任感,对整个社会道德产生全面的腐蚀,从而瓦解社会公正与合法性的根基;而其他职业的非道德化倾向,不仅大大增加了社会交易及其价值实现的成本,同时,也直接破坏了重承诺、讲信誉等社会整合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

二、当前中国职业道德问题的成因

当前中国职业道德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即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的现实;中国职业分化与职业伦理的发育水平。

首先,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对职业道德问题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存在于社会各职业群体成员内心的物欲恶性膨胀,构成了产生当前职业道德问题的内驱力。

历史表明,社会繁荣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社会的绝大多数成

员具有高涨的工作热情。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自己社会的精神动力系统。改革前,与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目标相吻合,一种以政治整合和政治实现为最高目标的社会理想与道德实践,被认定为对普通民众具有普适性的精神驱动力。改革后,针对旧体制中动力系统严重不足的缺陷,社会动力的支点有了根本性的变动:与发展市场经济这个社会目标相适应,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不再依赖克己、利他和奉献等道德的感召,而是依靠每个社会成员的利己心和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实践证明,这种价值取向的动力系统由于符合了人类的共性,符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符合了中国人的精神发展水平,使得中国社会十几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发展。但是,利己心和物欲像一头冲劲十足的怪兽,它既可以用来实现社会繁荣,又有不顾各种社会规范、自我扩张的倾向。而道德行为的完成,除他律(通过社会舆论)外,主要是通过自律。当人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私欲恶性膨胀时,在职业活动中,诸如职业良心、职业纪律、职业义务、职业信誉这些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便首先成为抛弃的对象。

2. 现实生活中大批暴发户,尤其是非法致富者的示范效应,形成了无视职业道德规范的外在拉力。

中国改革带来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是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据1995年的调查,在中国1994年年末的21518亿元银行存款中,占中国人口10%的贫困人口的存款只占存款总额的3%,而10%的最高收入者的存款却占存款总额的40%。问题不仅在于收入的差距,更在于造成这种差距的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现实告诉人们,最富者中的有些人致富的原因,不是由于才能和勤奋,而是由于社会关系、所居职位,或是其他与劳动的质和量无关的因素。这种情况不能不使社会成员产生相对的被剥夺感。有些心理失衡的普通民众在职业活动中既然很难以道德的方式实现自我,便很自然地滋生无责任化的倾向,并容易作出如下的选择:以暴发户为范

本,抛弃职业道德的约束,即通过不道德的方式来获得自我满足和社会承认。

3. 转型社会所特有的法制不健全,造成了对职业越轨行为缺乏足够的威慑力。

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资源配置方式,又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控制方式。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在社会控制方面一个具有特殊性的严重问题,就是在如何激发和利用社会成员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对个人私欲给他人和社会可能造成的破坏,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制止。一般来说,处于非转型期的各种常型社会,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有序化程度也比较高。而社会转型是一个废止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社会控制手段的权威性迅速丧失,新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建立和健全又需要一个过程。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职业越轨行为,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社会为这种越轨提供了充足的内心冲动条件,另一方面,对越轨造成的恶果又缺乏足够有效的制度化的惩治手段,这就形成了所谓“制度空子”。“制度空子”的存在,使不钻空子的人吃亏,钻空子的人占便宜。社会成员中的某些人作为“经济人”而非圣贤,对转型社会法制不健全的特定“情境”冷静权衡后,便很容易将“钻制度空子”视为一种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4. 转型社会所特有的文化价值困惑,使职业道德越轨行为具有来自社会文化氛围方面的宽容和默许。

不同的社会体制,需要、同时也具有不同的包括工作伦理在内的文化价值。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价值的结构性变动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新旧两种价值体系转换的过程中,原有的核心文化价值的地位下降,反映市场经济的价值要素的地位迅速上升;同时,与市场经济所内含的多种经济体制和利益主体相联系,社会出现了多元思想和文化并存的格局。这使中

国进入转型社会的文化价值困惑期：一方面，人们赞许市场经济高扬起的尊重个人自主、重视平等、追求效率等现代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个人、金钱和利益至上的观念，认为等价交换原则适用于一切社会领域的观念也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职业活动中，人们既有对“跳槽”等行为的宽容，又有对不给好处不办事等作法的某种程度的默许。由此可见，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价值的困惑，造成了职业道德规范的紊乱，进而导致职业越轨行为的增多。

其次，职业与职业伦理的发育不足，是形成当前职业道德问题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对职业可以有两种理解：在宽泛的意义上，是指谋生方式；在严格的意义上，是指以高度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独立的、专门化的社会活动。衡量狭义职业发育水平的重要标志，是职业与家庭的分离程度，以及狭义职业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职业概念，则是一定的职业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为了深入理解职业道德问题，不妨将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这两种不同形态文明中的职业道德的特点作一比较。在农业社会，由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男耕女织”式的家庭内部分工是职业分工的基本形式，这决定了农业社会的职业分化水平很低，职业与职业道德的社会化水平不高；也决定了职业道德首先是一种家庭道德。在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内在的专业化分工的要求以及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使工业社会的职业与职业道德有了很高的社会化水平，并最终脱离了家庭与家庭道德的窠臼，具有在农业社会不可能达到的重要地位。

职业道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除了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劳动分工论》中所说的社会整合方面的意义外，更在于它的社会经济价值。众所周知，优胜劣汰是市场的基本规则。职业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又是市场竞争的利器，换句话说，职业道德的

经济功能是为了用最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取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鉴于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职业观念在近代社会中的重要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深入分析了新教革命对人们职业观念的改变,以及人们职业观念的变化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意义。可以说,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职业活动的神圣性、职业活动的道德价值以及按照职业道德规范从事职业活动的正当性,在工业化国家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大多数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自觉活动。相比之下,中国由于没有受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现代职业道德和职业观念的产生缺乏合适的社会土壤。这种社会背景,使中国人倚重家庭及家族观念、政治及一般社会伦理观念,而缺乏明确的工作伦理及职业道德意识。因此,论及当前中国出现的职业道德问题,不能不注意到中国人在职业观念和职业道德的发育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历史事实。

三、对当前中国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与对策

思考之一:当前中国特别突出的职业道德问题,是由现实和历史双重因素造成的;解决职业道德问题,既是历史补课的需要,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

市场经济需要市场道德,首先需要现代职业观念与职业道德。职业道德作为控制个人职业行为的规范、处理职业人际关系的准则、社会认同与合作的基础,对于市场秩序与社会秩序都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因此要从建立中国市场经济和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高度,认识当前中国的职业道德建设问题。

思考之二:解决职业道德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既要有长期打算,又要有紧迫感。

职业道德问题不是孤立的,一方面,它从属于社会道德以及文

化规范,受整个社会及其文化价值观发育水平的制约,同时又与社会经济环境、各项制度建设、社会历史因素息息相关。因此,形成与中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职业群体普遍认同并付诸实践的职业道德规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另一方面,当前中国职业道德问题的严峻形势,表明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认真治理不可的地步。所以,社会对此应有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措施,力争使职业道德建设在一个较短时期内有明显的进展。

思考之三:解决职业道德问题,除了采取具体的措施外,关键要从制度建设入手。

当前中国的职业道德问题,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也不是个别行业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这反映了中国当前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当前中国制度性结构不成熟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目前的制度性安排,存在着个人行为的理性与整个社会运行非理性、眼前行为的理性与长期行为非理性的矛盾。因而,必须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上,将个人行为与社会运行的矛盾减到最低限度,从而使职业越轨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程度。

根据以上思考,对当前中国的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具体对策。

1. 加强市场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利用奖优罚劣机制,强化社会成员的职业观念与职业道德意识。

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是存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一个理论假设前提。既然职业道德的指向首先是市场,那么,在有关职业道德的制度建设中,就应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各种市场主体都明确认识到,自己的职业道德状况和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对于职业群体来说,应该使其认识到,是否有支配和有效控制本行业从业人员的制度化了的道德规范,是决定本行业和本单位能否得到社会承认,并获得较高的职业声望的重要依据;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应该使其认识到,对自己职业的

道德承诺以及在职业活动中对这种承诺的履行程度,将直接决定着自己的职业前途。

2. 确立适当的伦理价值,在新的契合点上进行职业道德建设。

特定的职业道德与文化价值存在内在的联系,具体说,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常常规范着职业活动的基本道德取向,例如,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全体社会成员核心理想价值的年代,工、农、商、学、兵、政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都受共产主义这一理想价值的规范。由于职业劳动具有社会性(产生社会公益后果)和私人性(主要是个人谋生手段)的二重性,对市场条件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必须使价值理想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同时,要变革“义利分殊”的传统思维模式,将利益机制引进职业道德建设,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尽可能紧地捆在一起,即在社会成员只能以促进社会的方式而不能以损害社会的方式来最有效地获得个人利益这一基点上,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3. 要以廉政建设为重点,整肃和重建职业道德。

当前中国的职业道德问题尽管具有普遍性,但在各个行业中,公务员阶层由于处于社会权力中心位置,其能否廉洁奉公、恪守职业道德,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具有关键的意义。因此,主要是依靠制度建设进行的廉政建设,应通过建立增加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和打击力度的制度和法规,遏制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并以此为突破口,恢复和重建职业道德,以及市场条件下的健康的商业伦理。

(作者为华中理工大学副教授)

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导控

陈必龙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置于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环境,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空前的裂变。变化之中既有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正效应,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努力弘扬正效应,限制以至消除负效应,是我们进行道德价值观念调控和导向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导控

这些年来,理论界在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讨论中不乏真知灼见,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不利于人们确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譬如,有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冰炭难容,认为强调道德建设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发展市场经济,思想道德建设滑点“坡”值得。还有一种看法是把经济与道德当作两个互不相干的社会生活领域,否定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导控作用。前种观点叫做“代价论”,后一种看法叫做“划界论”。这两种观点的表现形式尽管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把经济与道德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排斥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导控作用,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大有可商榷之处,在社会实践中是有害的。

首先,我们剖析一下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谬误。毋庸置疑,市场经济实质上是自由经济,它的自由特征主要体现在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经营自主性上,它确定了市场主体独立经营、自由竞争、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调节等自由权利。但是市场主体的自由并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式的任性,并不是可以任意损害他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抽象、绝对的无道德规范的放纵。它必然受到商品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为己性与为他性的矛盾所左右,市场主体为实现自己的利润,达到为己性目的,必须以提供一定的商品或服务来满足他人与社会的需要为前提,唯此才能实现由使用价值到价值,由商品到货币的转化,这既决定了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必须具有为他性的要求、也限制了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自由。它们就是在这种既自由又不自由的矛盾中求统一,求发展。然而,由于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主体在获取最大化利益的驱动下,又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商品经济的为己性与为他性割裂开来,强化其为己性,弱化其为他性。在实际市场行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倾向:一切能使市场主体获得最大利益或利润的手段都会被使用,而丝毫不顾及手段的合理性、合法性和起码的道德要求。假若让这些行为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使整个社会陷入尔虞我诈的混乱状态之中,最终亦将损害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自身利益。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就要求社会用某种力量来抑制这种自发倾向,使市场主体能够较自觉地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考虑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有序而健康地运转。显然,这里需要加强国家计划、价格指导,加强诸如反暴利、反假冒伪劣产品等等社会立法工作。无论是国家宏观调控,还是法制建设,都需要全社会公民有明确的善恶观念和强烈的道德意识的有力支持,都需要发挥道德的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以及教育的功能来调节市场经济下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其实,对于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内在联系,西方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道德不是一

个远离或外在于经济的概念,经济决策乃至经济管理也决不可能剔除道德等价值因素的影响,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道德行为。有的学者更加明晰地把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内在联系表述为“市场经济即是伦理经济”,这是很有见地的。就是说,对市场经济进行道德导控,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否认对市场经济进行道德导控的必要性,或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

其次,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看,市场经济与道德导控紧密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商品经济逐步孕育下诞生、发展起来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即以个人为本位的利己主义道德价值观念,在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向“垄断”转化,这种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道德价值取向,使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拜物教泛滥、道德沦丧,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严重扭曲。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300 多年历史过程中,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曾不断探索调整道德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早在 19 世纪初,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深表忧虑,提出以“合理利己主义”来防止个人主义的泛滥。20 世纪上半叶,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危害愈发严重,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不得不承认“旧个人主义”已经“过时”和“破产”,提出用“新个人主义”概念代替“旧个人主义”。到了本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有一批有识之士更从社会未来发展的角度,反思个人主义道德观念的得失,集中批判个人主义道德观带来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自我表现主义、虚无主义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对抗的无限膨胀的个人私欲给社会造成的困境,辛辣地指控个人主义道德价值观念。据报道,目前一些美国学者对东方特别是对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念感兴趣。然而,建筑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